

## 20 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社会与文化 ——以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农村调查为中心的探讨

周建新, 曾过生

(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伴随着中央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了更好地得到赣闽粤边区民众的认可和支  
持,就需要很好地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为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赣南、闽  
西的集中调查。从空间区域上来看中央苏区与赣闽粤边区这个客家大本营地区大致吻合,换句话说就是,中  
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做的农村调查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客家社会的调查,因而这些调查对研究 20 世纪初期赣闽  
粤边区的客家社会与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毛泽东;赣闽粤边区;农村调查;客家社会

**中图分类号:** K26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1-0082-07

## The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Adjacent Border Areas of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aking MAO Zedong's Survey of the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as an Example

ZHOU Jianxin , ZENG Guosheng

( Hakka Research Centre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War ,with the building of the Central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of the local people it's  
necessary for the Red Army to get a good sense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local culture. For this  
purpose MAO Zedong conducted numerous rural surveys and interview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the west of Fujian province. Coincidentally ,the range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is roughly similar to the range of the main Hakka areas. In other words ,  
MAO Zedong's surveys of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are also the surveys of the main Hakka areas in one sense. Therefore ,these investigations are the val-  
uable references to the study of the Hakka society and local culture of the adjacent border area of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收稿日期:2012-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客家文化研究”(编号:12&ZD13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毛泽东  
赣南调查的再调查与客家社会变迁”(编号:SH0901)

作者简介:周建新(1973-),男,江西萍乡人,博士,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客家族群和区域  
文化。

曾过生(1986-),男,江西南康人,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1 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客家  
社会与经济。

**Key words:** MAO Zedong; the adjacent border areas of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rural survey; Hakka society

## 一、引言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伴随着中央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了更好地得到赣闽粤边区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就需要很好地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为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赣南、闽西的集中调查。早在 1927 年 3 月,毛泽东在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之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后来他被派往江西萍乡安源指导工人运动,详细调查了安源煤矿工人的情况。中央根据地开辟以后,为了应对土地分配、国民党“围剿”等各方面的现实挑战,毛泽东在艰苦斗争的同时开展了许多农村调查研究,并写出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告,尤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较为经典,“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等都是通过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总结出来的。巧合的是,从空间上来看中央苏区与客家大本营地区大致吻合,换句话说就是,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做的农村调查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客家社会的调查,对 20 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社会与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拟以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几个重要农村调查即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中涉及客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内容进行梳理并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 二、20 世纪初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社会

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所作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等调查涉及的区域范围相当广,几乎涵盖了整个赣闽粤边区,内容也非常地翔实和丰富。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些调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微观的客家社会与文化风貌图,是 20 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的一部客家社会史。就其调查内容而言,它主要包括了客家地区的宗族、民间信仰、阶级构成、土地制度与斗争、妇女与儿童、剥削方式等。

### 1. 宗族社会

根据毛泽东在寻乌县的调查,寻乌聚族而居的现象极为普遍,且大部分建有祠堂,拥有公田。公田一般出租给他人耕种,年年收租。寻乌县宗族势力在当地很强,这一点仅从寻乌当时的公田占总田地的百分之四十便可以看出。“祠堂属下子孙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肉有四个项目:一是‘昨肉’;二是‘房股肉’;三是‘老人肉’;四是‘丁肉’。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这是一种斗争,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对分房股肉,主张分丁肉。但结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数少的房份的意见分了房股肉。为什么少数对多数胜利呢?因为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sup>[1](p177)</sup>”,“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山地因其生产力小,通常一姓的山,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条把子树,搭墓棚’,才得许可<sup>[1](p200-201)</sup>”。宗族内部房系间的争斗与宗族姓氏间的争斗也反映出了寻乌宗族的发达。其实不只是寻乌,整个客家地区的宗族制度都是比较发达的,原因是客家地区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存在大量的公学款产。何谓公学款产?公款公产是指寺、庙、观、祠、社、馆、公所、局帮绝产及其他团体的款产;学款学产是指文会、书院、采芹、膏伙、宾兴、伏马田、学田、学租、学产、书田以及其他关系教育的款产<sup>[2](p88-93)</sup>。藉此缘由,南康县于 1939 年 9 月方始成立县有公学款产清理委员会(清理完后有的县改称“公产管理委员会”或“公产保管委员会”)。客家地区为什么会有如此发达的宗族制度呢?学者认为“客家地区宗族制度发达,溯其原由,既有传统的‘崇本报先’、‘慎终追远’观念,亦与客家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sup>[3](p49-53)</sup>。

## 2. 宗教信仰

根据毛泽东所作的调查,寻乌县城旧时的“神”是多元的,“许多都有会,如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大神会、真君会、婆太会、赖爷会、公王会、伯公会、文昌会等等,都是没有庙的。还有一种醮会,祈神之用,也属这一类。在上述的各种神内有一部分是立了‘坛’的。坛是立起一块石头,有的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那里面藏著好灵验的神呀,因此叫做坛<sup>[1](p178)</sup>”。这些神的祭祀道场便有神、坛、社、庙、寺、观六种,这六种所占土地的比例是8%,占全部公田的20%。毛泽东在《寻乌调查》里还提到客家民众很重要的一种民间信仰,那就是“伯公”信仰,有的还称为“公王”或“社官”等,这在客家地区很是普遍。他了解到“开禁山会的那天,不但禁长们到,而且那个范围内每家都到一人,每人自带酒饭,另外出一毛子或半毛子买菜,并买敬‘伯公’(‘伯公’就是杨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个树头下,田埂下,山垌上,什么地方都有他)香纸”。此外,赣闽粤边区的农村还存在巫术和道教的。《长冈乡调查》就有记载“老婆太敬神的(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本土宗教信仰外,寻乌还有基督教信仰,毛泽东统计到“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200多人,一个天主堂100多人,草乡一个耶稣堂100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100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5个700人左右,天主堂100多人,共800多人。”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把客家族群作为主要的传教对象,既与客家人近代的境遇有关,又同洪秀全拜上帝教政治需要契合。此论的正确性尚且不论,然而基督教在客家山区广泛的传播确是事实,不仅是寻乌一地,其他如粤东的梅县、蕉岭、五华、揭西等地基督教均较为兴盛。

## 3. 阶级构成与土地分配

毛泽东在调查过程中,特别关注客家社会当时的人口阶级构成,因为这有利于红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土地分配,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在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对当地的人口构成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1930年寻乌县与兴国永丰区农村人口构成状况

人口成分	寻乌(全县)农村人口构成状况(%)	兴国永丰区农村人口构成状况(%)
大地主	0.045	
中地主	0.4	1(地主)
小地主	3	
富农	4	5
中农	18.25	20
贫农	70	60
雇农	0.3	1
手工工人	3	3
游民	1	2
小商人	/	3

资料来源:《毛泽东文集·寻乌调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卷,第175—176页,《毛泽东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调查文集》第148页。

由上表可知,无论是寻乌还是兴国,人口的阶级构成中都是贫农占大部分,分别高达70%和60%,其次是中农和富农。然而,农民占有的土地却是极少的,如表2所示:

表 2 1930 年寻乌与兴国永丰区土地占有状况

土地占有种类	寻乌农村土地占有比例 (%)	兴国永丰区农村土地占有比例 (%)
地主占田	30	40
公田	40	10
富农占田		30
中农占田	30(农民占田)	15
贫农占田		5

资料来源 《毛泽东文集·寻乌调查》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一卷,第 176 页,《毛泽东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调查文集》第 148 页

然而,周建新、周琍的研究表明,赣南粤东闽西客家地区内部之间,土地和阶级关系又有其差异。总的来说,赣南和粤东情况大体一致,而闽西则有所差别。由表 1 和表 2 我们不难看出,寻乌地主所占土地并不算很多,而且人数也很少,只占总人口的 3%,人口的主体还是没有土的的贫农与游民。据 1929 年调查结果显示,闽西的地主占总人口的 7.7%,超过了赣南和粤东。在寻乌族田和地主土地所占的比例上,两者分别是 40% 和 30%。20 世纪 30-40 年代,粤东的梅县和平远等地的族田亦各占土地面积的 40%,丰顺县达 30% 多。而闽西地主所占土地达到 63.5%,族田为 24.9%<sup>[3] [p49-53]</sup>。由此可见,闽西土地集中的程度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综上所述,在 20 世纪初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社会里,主要的阶级主体是贫农和中农。这一阶级群体仅占有极少的土地资源,在一个农耕社会里,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生活的艰难。他们不但不得不依附于地主豪绅,还得承担各种各样的剥削,比如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税捐剥削等。因此,这一阶级群体也具有非常强的革命性,是共产党和红军要团结的主要对象。

#### 4. 客家妇女

毛泽东在其农村调查中对妇女问题尤为重视,几乎在所有调查中都有涉及,因为他深知妇女问题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它关系人民群众的真正平等和解放。1930 年 6 月毛泽东在赣南寻乌调查后来到才溪,召开妇女代表座谈会,对柴米油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尽管那时对客家的概念还没有明显的意识,但其研究调查的中央苏区妇女问题实际上就是客家妇女的问题,他写下的调查报告为我们了解 20 世纪初客家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

(1) 参与大部分生产生活的劳动,生活艰苦。《寻乌调查》中就提到“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薅田、耘田、捡草、铲田、戽田、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答谷、踏碓、淋园、薅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烫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另外,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调查黄大春家庭时也说到“妻三十一岁,砍柴火挑到白鹭市上去卖(茶干去白鹭十里),卖了钱来买米煮,又要煮饭,又要种菜,又要洗衣服,非常之苦”<sup>[4] [p143-144]</sup>。

#### (2) 妇女解放,热衷于革命

由于当时的妇女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到的压迫较多,土地革命宣扬的民主、平等、分田分地等思想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赣闽粤边区客家妇女的革命热情,既促进了客家妇女的解放又推进了革命的发展。例如《寻乌调查》就对此有形象生动的描述,即“这回四军二纵队打篁乡反动炮楼,篁乡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客家妇女地位的变化还体现在她们参与政治生活,“女工农代表会每村一个主任。由各个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代表会的主席团”<sup>[1] [p312]</sup>。客家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女代表的比例,在福建上杭县的上、下才溪乡都超过了 50%,如表 3 所示:

表3 福建上杭县上、下才溪乡代表性别构成

时间	上才溪			下才溪		
	代表总人数(人)	女代表人数(人)	女代表所占比例(%)	代表总人数(人)	女代表人数(人)	女代表所占比例(%)
去年(1932)10月选举	53	16	30	73	21	30
补选以后,至今年(1933)10月选举	53	33	60	73	43	60
此次选举	75	43	60	91	59	65

资料来源:《毛泽东文集·才溪乡调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卷,第325页

这一方面表明客家妇女参与革命的热情极高;另一方面表明妇女的政治地位与作用不逊色于男子。妇女在土地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sup>[1] [p314]</sup>。

### 三、20世纪初闽粤边区的客家经济

毛泽东在寻乌县的调查中,商业经济与市场网络是整个调查里最为重要也最为详细的部分。在长冈乡调查中,他也对市价、油盐、耕作等经济生产有专门论述,才溪乡调查更是着重谈到了经济生活,兴国调查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与八个家庭的生产生活问题。这几个调查大致勾勒出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客家的经济概貌,譬如根据《寻乌调查》提供的数据,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 寻乌、安远等赣东南各县出口货物以米、油、豆等农产品为主,进口货物主要是以盐、海味、洋货为主的日用生活品和日用工业品;梅县、兴宁等粤东地区除出口部分自产日用工业品外,还需进口大量粮(米)、油、肉禽蛋等食品品和日用工业品。此外,闽西也需从赣南进口猪等肉禽产品。

2. 农林副产品主要从赣东南向粤东南流,潮州、汕头、兴宁、梅县等粤东的盐、日用生活品、日用工业品向闽西和赣东北流;南北交流是赣闽粤边区商业贸易的主流。赣闽粤边区输出产品以农林产品为主,进口产品以食盐、洋油和其它近代工业品为主。寻乌地处赣闽粤边区的三交之地,在当时的南北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实,明清时期大庾岭通道是江西乃至全国非常重要的一条商道,那时赣闽粤边区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寻乌位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区,自然也就成为了赣闽粤边区的一个贸易中心。“石城、瑞金的米到(筠)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属武平县,位于三省交界地带)、新铺(属蕉岭县,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过”、“大宗是洋货、海味、盐……(筠)门岭去梅县,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这些都表明赣闽粤边区以圩镇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经济网路。而这个网络的主线一度是“盐粮流通”,所谓的“盐粮流通”问题是指历史上粤东、闽西皆极度缺粮。闽、粤、赣边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除赣南部分地区粮食略有盈余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粮食是欠缺的<sup>[5] [p33-39]</sup>。粤则盛产海盐,盐在传统社会是官营,且划有盐区,赣州属于淮盐区,然淮盐属于河盐,色泽质量颇差,且运到赣南路途遥远,这在交通不便的过去是很不方便的。相比之下,潮盐属于海盐,质量好、成本低,故一时赣闽粤贩运私盐者甚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盐上米下”的赣闽粤盐粮流通网络。《兴国调查》有云“兴国的盐,都是从广东来的,贫农兼做盐生意的颇多。本区百家贫农,有十家兼去挑盐。没有本钱,向富农借,收买鸡挑往嘉应州(广东梅县),一担鸡去,一担盆回,借洋一元,还盐一斤做利”那时兴国很多人从事贩盐,其中包括大量贫、中农,但受盘剥较多。当然,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就是“以米易盐”,《长冈乡调查》中就有相关描述“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几全受水害),豆价也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盐,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换”。

综上所述,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从经济联系上来看都是一体的,由于“八

分山水一分田,还有半分道路与庄园”的地理现实,赣闽粤大部分地区都是一种较为典型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区交换型经济。这种经济过分依赖外部市场,经济缺乏内生性,难以形成扎根本土的高效产业。寻乌就是个典型个案,主要向粤东北地区输出大米、黄豆等农副产品,从赣州、武平等地则主要输入食盐、洋货等手工业品。随着近代交通的兴起,大庾岭商道没落,这极大程度上削弱了赣闽粤边区的经济地位,加上社会文化、经济模式等方面的限制,赣闽粤边区的经济一度迟滞不前。

#### 四、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的客家文化与教育

1930—1933年,毛泽东对寻乌、兴国、上杭都做过详细地调查,其中都比较关注文化方面的调查,从这些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化教育方面的许多具体情况。

##### 1. 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

清末民初,中国广大乡村社会的文化主导仍然是传统精英模式。尽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的文化短时间内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知识分子并没有因社会的变革与城市的发展而大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真正转移的是属于少数的高层次知识分子,大量的低层次知识分子还是留在了乡村。换句话说,拥有知识资源的文化精英仍是客家地区社会精英的主体。1930年,毛泽东通过对寻乌县的文化调查发现,寻乌有初小学生5000人(占总人口的5%),高小学生8000人(占总人口的8%),二者加起来13000人,占总人口的13%,而高小学生多于初小的缘由就是“进高小的多由读蒙馆后直接进去的”。毛泽东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读书人跟当地大兴学校息息相关,“全县初小每区不出十个,七区共七十个……此外半新不旧的初小,有其名无其实或者连招牌也没有挂的有八十多个”。事实上,这些相当于科举时代童生与低级功名者的小学生大多只在本乡本地活动,并没有大量的离乡趋城,不存在大规模的外流现象,且整体的规模较以往更大,人数更多。一是因为清末大兴教育,客观上使读书人更多;二是因为他们处于知识分子中的初级阶层,他们是没有达到入城飞黄腾达或获得较好就业的条件,呆在更能体现自身价值和地位的农村反而更有用武之地。因此,尽管20世纪初期的赣闽粤社会受到城市发展、教育转型等近代因素的冲击,但拥有知识的文化精英仍然是赣闽粤边区社会精英主体。他们对当时社会的文化仍有主导性的影响力。

##### 2. 土地革命对文化、教育的影响与整合

土地革命在赣闽粤边区的开展无疑会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状况与土地革命的条件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现实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土地革命形势,而土地革命也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以文化教育来说,革命需要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这就要求对象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同时,为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需要大兴近代教育,普及基础教育。由于白天有生产生活任务,民众很难有时间上课学习,于是夜校在各地得以推行。在兴国调查时,毛泽东对女子教育的情况作了详细统计:“平民夜学校村村都有……多数夜学有女子参加,占全额三分之一”,在兴县长冈乡,女子参加学习也非常踊跃,当时九个夜学中女学生占了大多数,学生“共约三百。男约百分之三十,女约百分之七十。”其中,妇女不仅参加学习,还参加了教学管理“九个夜学校长,女的占五个”。在长冈乡,苏维埃政府在全乡设立列宁小学,一共有4所,每村1所,分别有校长、教员,均分甲乙丙班。政府还根据需要设立了识字班,3至10人为一组,组长多为夜学学生,随时随地随人数教。不仅如此,全乡还设立了俱乐部,每村一个,下设体育、墙报、晚会等多个委员会。另外,才溪乡也对文化教育特别重视,分别设有日学、夜学、识字班、读报团、俱乐部、墙报等。那时苏区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儿童教育。当然,中央苏区在发展儿童义务教育的同时,还大力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努力提高青年的文化水平<sup>[6](792)</sup>,办夜学等就属于扫除文盲运动这类。

由上文可知,中央苏区时期,革命文化某种程度上丰富和改造了当地的社会文化,也对原有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整合,尤其是文化内涵上的融合,乃至形成了今天赣闽粤边区客家文化与红色文化相交融的文化特色。

### 3. 客家方言民俗

为了让文章更加通俗有趣,毛泽东在这几个调查报告里使用记录了大量的客家方言,行文句式较客家口语化,很多语言就是音译过来的,如:

一掌平/油、豆、盐在这里过驳/三个份子/吊多钱本  
有零年了/衰下来/打雷公/有点把子/顶大门/现在了了  
讲口/反口/夜学顶好

客家方言大量地保留了唐宋古音,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古汉语的一块活化石,为我们研究客家方言、民间文学等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在《寻乌调查》中就记录了一些客家民谣,如: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这些歌谣以简单质朴的语言描述了客家人的生产生活以及他们的情感世界,这就为我们了解客家人的文化与精神开辟了新的路径。

## 五、结语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期的赣闽粤边区,该地给当时的土地革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之成为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中心。究竟是这片土地选择了革命还是革命选择了这片土地,20世纪初期赣闽粤边区苏维埃革命的蓬勃发展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围绕这个问题,言巧合者有之,议大势所趋者亦有之。笔者以为,这是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结果,具体原因无与本文关系不大,笔者将在另文再行探讨。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深入开展的农村社会调查,使他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以客家族群和文化为主体的赣闽粤边区社会,并敏锐地找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在这个区域开展的关键。这使得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来制定方针政策,从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保障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林显材.制度安排与地方应对——以民国时期江西省南康县公有款产管理委员会为中心的考察[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4).
- [3]周建新,周琍.《寻乌调查》与20世纪初的客家社会经济[J].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调查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5]周琍.明清时期闽粤赣边区的“盐粮流通”[J].盐业史研究,2006(03).
- [6]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吴贇)